

唐代边塞诗的

文化阐释

任文京 著

人民出版社

《唐代边塞诗的》
文化阐释

任文京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方雅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任文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ISBN 7-01-005360-X

I. 唐… II. 任… III. 边塞诗派—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568 号

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

TANGDAI BIANSAISHI DE WENHUA CHANSHI

任文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8.5

ISBN 7-01-005360-X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詹福瑞

文京敏于行而讷于言，为人做事都十分谨慎。任出版社总编多年，恐怕算起来也说不了多少话，但却策划编辑了许多好书，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加之其他编辑的努力，心灵史丛书、大江大河丛书、著名实验室丛书、清华哲学丛书等，成一时之盛。

2001年，文京考取了我的博士生，与查洪德、张蕾同班。洪德来前就已经是高校学报的主编了，而且在元代文学研究方面已有成绩，张蕾也在师大教学多年，刻苦好学，肯于钻研。他们三人和我在一起，不仅是教学相长，而且是学学相长。对他们的学习我是比较放心的。不过，当文京告诉我要以唐代边塞诗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还是颇为担心。

边塞诗在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边塞诗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正因为地位重要，加上边塞诗更多表现出的是英雄主义精神，容易激发读者的积极向上思想，自然属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范围，所以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是唐诗研究的重点，七十年代以后，更成为唐诗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再寻求突破就很难。所以近些年来，由热逐渐变冷，研究的著作和文章越来越少。不仅是唐代文学的研究，其他朝代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即以这些年的博士论文来看，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研究已经十分稀见，一流作家的研究也难得一见了。研究杜甫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二，那恐怕是导师坚守不退的缘故，而

研究李白的博士论文就多年不见了。大家都去找前人很少或较少涉及的领域，选题的方向自然朝向二三流或者根本就不入流的作家。生平思想以及诗文都少有人涉及，稍加爬梳即可成文，写得稍有起色，也可获填补空白的评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冷门。但是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与其说是得益于研究范围的拓展，不如说更依赖于重要作家和现象的研究的深入。哪怕是小小的斩获，也是可喜的推进。道理如此，但是做起来谈何容易？

不过当我与文京商讨论文大纲时，文京对边塞诗一些问题的思考，使我觉得不仅论文可做，而且有了一种期待。

现在，再看这部文稿，越发清晰地看到，论文的成功或特色，在于它多维的视角。作者熟练地运用“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维的角度来考察唐代的边塞诗，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旧的话题就能多有新说，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比如论文从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总结出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并把历史意识与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组成部分，就超出了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地名和人名作为比附手法的认识，研究的穿透力更强。还有关于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的联系的考察，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塞从戎起了一定作用，也对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和培养浓郁的边塞情怀产生了重要影响，都是前人较少谈及的问题。它如文中对石堡城、怛逻斯之战的分析，也都因为看问题的全面圆融而有了说服力。正因为作者视野比较开广，所以在论述问题中能收放纵横，表现出较浓的理论分析色彩。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论文不重视传统的文献和实证。论文不仅广为搜罗常见的文献，还特别注意发掘稀见材料，并且运用了统计的手段，如唐代边塞诗人籍贯和出塞游边情况的统计，都为作者的论述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和实证。

正基于以上原因，我有理由相信专家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它

弥补了以往边塞诗研究的不足，开拓了唐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文京可以说是壮年问学，他对人生、社会和文学早就有了个人成熟的认识。对专家的褒奖他自然会平静而平实的对待。我这样说，文京自然知道它的含义。就是希望他不会就此止步不前，中国古代文学、唐诗、唐代边塞诗，我们终其一生，也只能知其一二。什么时候能离开尔虞我诈的是非场，沉潜下心来，把一点才华用来不是浪费生命的研究呢？

2005年12月1日于国家图书馆

绪 论

边塞诗作为一种较为特殊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其产生伊始就有品评出现，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但是，真正从文学流派角度对其研究，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因为边塞诗与边塞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最初的研究者均以战争文学视之，如1927年胡云翼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1933年苏雪林出版《唐诗概论》，其中第八章的题目为“战争和边塞的作品”。因属最初研究，尚嫌简略，然而创始之功不可磨灭。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末，边塞诗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研究的鲜明特点。然而这一时期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也使边塞诗研究出现了偏差，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边塞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0年，吴学恒、王绶青在《文学评论》发表《边塞诗质疑》一文，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该文将唐朝开元后期至天宝期间唐王朝对其他民族的战争说成大都是不义之战，这种从历史角度入手的研究方法也将大部分反映边塞战争的诗歌基本否定。随后，不少学者撰文商榷。刘先照发表《评边塞诗——兼与吴学恒、王绶青、涂元渠等同志商榷》，吴庚舜发表《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禹克坤发表《如何评价唐代边塞诗》。学术争鸣使研究者的视野得到拓展，边塞诗研究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1984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唐代边

塞诗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提交大会的百余篇论文中，关于边塞诗研究方面的论文就占 60 多篇，边塞诗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会后整理出版的《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便是其中的精华。这一时期边塞诗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关于边塞诗繁荣和边塞诗评价问题；关于边塞诗中反映的战争性质及其爱国主义精神的研究；关于中晚唐边塞诗的研究；关于边塞诗中反映的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论文之外，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孙映逵的《岑参诗传》，李云逸的《王昌龄诗注》，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等的《高适岑参诗选》等。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边塞诗研究，除了对上述几类内容继续探讨外，还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边塞诗意象、美学风格以及诗人情感等方面的研究。二、对边塞诗继承问题的探讨，如关于唐代边塞诗对建安时期边塞诗的继承关系。三、比较研究。边塞诗人之间的比较研究：如高适与岑参的比较研究、王昌龄与李益的比较研究。诗人群体之间的研究，如初唐四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人作品的比较研究。跨时代的比较研究，如唐代边塞诗与北宋边塞诗的比较研究。四、边塞诗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如陇右地域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唐代边地幕府与边塞诗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专著有：刘开扬的《岑参诗集编年笺注》，胡问涛、罗琴的《王昌龄集编年校注》，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岑参集校注》，廖立的《岑嘉州诗笺注》，李珍华的《王昌龄研究》，余正松的《高适研究》、胡大浚等《唐代边塞诗选注》等，余恕诚《唐诗风貌》等也辟专章对边塞诗进行论述。总之，几十年的边塞诗研究既有量的增加，也有质的提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充分显示了边塞诗在唐诗中的特殊地位。

在充分肯定边塞诗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边塞诗研究领域尚有许多东西需要挖掘。边塞诗人作品的整理

和相关材料的钩沉固然重要，但仅靠对诗歌的解读往往使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视角的狭窄和单一必然会给研究带来思维局限。边塞诗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唐代的历史、地理、军事、民族、政治等等，都与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边塞诗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入手，最终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也是多年来众多研究者围绕某些问题争论不休而又无定论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历史—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许多人文学科的情况下，对唐代边塞诗进行文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王水照先生说：

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样化，对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边界的认识反而有些模糊起来，但这正酝酿着突破的契机。许多学者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以为继，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以扩展学科发展的空间。^①

“历史—文化”研究要求研究者将边塞诗放归到唐代的社会情境中去，运用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军事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采取多视角的透视，对边塞诗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近些年来，在边塞诗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与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颇令人瞩目。例如，薛居正的《安西与北庭》、《中亚内陆——大唐帝国》、苏北海的《西域历史地理》、史念海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等，均对唐代边塞诗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资料。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对研究唐

^①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王水照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代社会心理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李鸿宾的《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李大龙的《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马曼丽的《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等，则从民族学角度为唐代边塞诗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我们应该正确处理文学与史学、诗歌与本事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将诗歌简单地视为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图解，而是力图将诗人及其作品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傅璇琮先生说：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①

将文化研究引入边塞诗研究，一方面通过边塞诗展示当时广阔而生动的文化背景，展示边塞诗与当时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边塞诗产生发展带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唐代的文化背景下，对边塞诗人及其作品进行审视，发掘出边塞诗和诗人行为方式及心态所包含的文化底蕴。

对边塞诗歌进行文化研究，不是将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潮等机械地罗列，而是将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人能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图景、文化氛围和时代精神，从而使边塞诗在文化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的再现。在文化背景下审视一个诗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是孤立

① 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傅璇琮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的和偶然的，有时一个很细微的现象，恰恰是我们理解诗歌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的重要门径。文化在影响和制约着他们，他们又通过言行反映文化，无数诗人的个性凝聚成共性，而这共性恰恰属于时代。例如，唐代边塞诗人多次在诗中提到“投笔从戎”，诗人如此，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呢？查新旧《唐书》和《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发现，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投笔从戎的人都很多，诗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他们用诗歌反映社会，记录时代的普遍追求，也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们由此可以寻到诗人投笔从戎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依据。又如唐代边塞诗人屡次提到汉代军伍英雄，而唐代史书和墓志中也反复提及这些英雄，这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诗人的汉代情结是整个社会汉代情结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整个社会的汉代情结，诗人的汉代情结就失去了文化土壤。

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并非仅仅因为两个朝代版图辽阔，国势强盛，还在于汉唐文化的共性及唐代对汉代精神的传承。唐代边塞诗中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事英雄，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追溯，也不同于一般的怀古，而是在寻找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是唐代边塞诗人深沉的历史意识使然，这种历史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唐代的文化土壤。边塞诗人生活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其社会心理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因此，汉代精神在唐代的发扬光大，汉唐文化的融合，在边塞诗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例如，唐代边塞诗人对班超的向往，对霍去病的赞美，对马援的敬佩，对李广的呼唤，使他们将汉代军伍精神上升为一种文化并以此来评判社会，确立价值取向。所以，诗人笔下描写的是唐代社会，反映的却是汉唐共有的一种文化精神。汉唐历史就这样被打通，汉唐文化、汉唐精神就这样被衔接了。如此来看，唐代边塞诗中反复提到汉代军伍英雄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現象了，边塞诗中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

唐代边塞诗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谓历史阶段，不应仅仅包括时间，也包括空间，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才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立体舞台，尤其是边塞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法国批评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非常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文艺的影响。近年来，将文学与历史地理学结合研究而取得成功的不在少数，如李浩用文学地理学的成果来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创新思维，完成《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土族研究》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金克木先生曾说：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研究吧。^①

唐代边塞诗研究也应借助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知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北方籍诗人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北方地理环境与尚武风气形成的关系，甚至北方籍诗人的性格、气质也与其长期的地理生活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考虑到时代的因素，又考虑到地理因素，这样来分析唐代边塞诗人和边塞诗，就会有新的收获。

唐代边塞诗从初唐到晚唐，时间跨度大，涉及诗人多，有些诗人的生平较为清楚，而有些诗人的生平则比较模糊，同样，一

^①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见《探古新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些诗歌的本事比较明确，系年也可确定，而有些诗歌写于何时，为何而写则难以考证，所以，本书研究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即对所有的边塞诗进行解读，充分吸收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力图对边塞诗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资料的利用上，既重视正史，也参考野史，尤其借鉴交叉学科研究的新成果，采用宏观着眼，细部阅读，诗史互证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力图发现边塞诗发展脉络上的联系以及材料与材料之间的联系，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等，最终找到诗歌与历史材料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为唐代边塞诗寻求一种新的阐释。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书也使用了计量方法，如唐代边塞诗人籍贯与出塞情况的统计，以便清楚地说明地域文化对诗人出塞的影响。又如天宝初十节度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等，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边塞诗歌产生的文化背景。也有的是对某一个诗人的局部统计，如对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词语统计等。无论是数据统计还是图表分析，都是为了更直观地说明问题。本书中涉及的地名、方位等，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一些数据经笔者依比例尺测量计算。

目 录

序.....	詹福瑞 (1)
绪 论.....	(1)
第一章 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	(1)
第一节 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1)
第二节 慷慨激昂的尚武精神	(11)
第三节 雄豪尚气的任侠精神	(23)
第二章 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和英雄意识	(31)
第一节 浓郁的汉代情结	(31)
第二节 强烈的英雄意识	(56)
第三节 唐代边塞诗中的封侯现象	(65)
第四节 唐代边塞诗在中华民族精神 建构中的作用	(70)
第三章 唐代社会文化对诗人入边幕的影响	(77)
第一节 边地幕府对人才的需求	(77)
第二节 影响诗人入边幕的其他因素	(87)
第三节 边塞诗人入边幕的矛盾心态分析 ——以岑参为例	(94)

第四章 地域文化对边塞诗人的影响	(107)
第一节 地域文化对诗人出塞及创作的影响.....	(107)
第二节 边塞诗人的地理视野.....	(129)
第五章 唐代边塞诗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	(143)
第一节 边塞诗人心态的转变.....	(143)
第二节 边塞诗人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	(152)
第三节 边塞诗人的人文关怀.....	(169)
第六章 唐代边塞闺怨诗研究	(186)
第一节 边塞闺怨诗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186)
第二节 边塞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	(191)
第三节 从边塞闺怨诗看时代盛衰 和价值取向变化.....	(206)
第七章 边塞诗中战争与和平主题的再评价	(213)
第一节 边塞诗战争主题评价的基本出发点.....	(213)
第二节 关于石堡城之战和怛逻斯之战的分析.....	(219)
第三节 边塞诗中的民族友好主题.....	(234)
主要参考文献	(248)
后记	(254)

第一章 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朝初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庶达到了最高峰，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富有吸引力的国家。“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①辽阔的疆域，清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唐朝在对待华夷问题上不像以往那样界限分明，而是视华夷如一。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原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②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③胡汉一家，文化交融，改变了因循守旧的文化状态，对于唐朝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包容的胸怀，以及呈现出气势恢宏的大家气象，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郑处海：《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6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响。在这种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唐代诗人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具有蓬勃的朝气、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他们积极追求人生理想，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科考制度的改革为士人开辟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唤起了士人空前高涨的进取热情，科考及第可以开通理想之路，科考落第仍有各种选择。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动荡和分裂之后，唐代人对于统一的局面非常珍惜，对边防的安危非常关注。因此，不仅科考的失意者，就是及第者也多慷慨激昂从军，投书干谒入幕，千里游边，考察地理军情，上言献策，意气风发。他们议论时政，批评朝廷，斥责奸佞，歌颂英雄，心存崇高之念，胸怀鹏图大志，具有强烈的人生使命感，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他们也会遇到挫折，但在挫折面前决不灰心丧气、颓废虚无。体现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不是哪一个阶层和群体，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我们先看史料的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四《马燧传》载：“燧少时，尝与诸兄读书，乃辍卷叹曰：‘天下将有事矣，丈夫当建功于代，以济四海，安能矻矻为一儒哉！’”想到的是建功以济四海，境界高尚，目标远大。《旧唐书》卷一百〇八《崔圆传》称其“志尚闳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素怀功名。”也是立下济天下大志，并非只是虑及一己之利。《唐代墓志汇编》^① 开元三一七载李元光墓志铭曰：“公少负英毅，志怀忠勇，力拔河山，气射云物，常有言曰：‘大丈夫不继单于颈，不碎颜良军，曷以答圣朝之休美，绍先人之鸿业。’遂投笔戎幕，冀灭雾侵。”发言立志，首先从国家利益出发，以不负时代圣明。《唐代墓志汇编续

^① 本书所引《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均为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代墓志汇编》为1992年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2001年版。